



学者·官员·企业家

—— 贺阳文集

中国经济出版社

学者·官员·企业家

——贺阳文集

贺阳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耀彬

电话(FAX):68353705

封面设计:孙海英

学者·官员·企业家
——贺阳文集
贺阳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125 印张 240 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017-3911-0/F·2807

定价:18.00 元

序

萧灼基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十八年头,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与改革初期比较,我国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已有很大进展。这种物化的成就、有形财富的增加举世瞩目。改革开放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们思想意识发生深刻变化,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人才茁壮成长。这种非物化的、无形的成就,“人的解放”,意义更加深远。它不仅弱化了改革的阻力、增强了改革的动力,而且为后续的改革打下基础。这些年来,大批具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在驾驭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心应手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理论家不断出现,就是非物化成就的物化,无形财富的有形化。

在这批新型人才中,贺阳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做过农民、工人、行政官员、研究人员,现在又下海从商,在传统的工农兵学商五业中,除了没有当兵外,其余四业他都经历过。理论界有这种经历的人并不多,理论成果突出的更少。这部文集,正如书名所标示,是一个官员、学者和企业对中国改革的思考和探索,颇有特色。

贺阳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有需要而作。作为体改官员,他要面对体改的宏观形势,还要面对自己职权范围内出现的问题和难题。他的文章,都是为改善体改的宏观环境和微观条件而作的。与专业学者的学术论文不同,他的理论、观点、意见和对策建议,不仅从实践中来,有深厚的实践基础,而且要回答实践中提

出的问题并为实践所接受,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写于1993年7月的《理清思路排除障碍——深化中国改革的关键》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力作。文中提出的深化改革的三个方面,从产权制度入手改革国有企业,大力发展各种非国有制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现在看来仍很新鲜。文中提出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六个方面条件产权明确、政企分开、两权分离、让企业面对市场竞争、资源配置机制要合理、企业的负担要合理,现在看来仍具有针对性。与实践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工作报告不同,他的论文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虽然许多文章论的是很现实的问题,甚至是他自己必须完成任务,但他善于“小题大作”、“借题发挥”。写于1992年7月的《北京市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战略之我见》,题目标示的是“北京市”,但其论棕的内容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下大力量培育市场”、“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等,又把问题提到理论高度,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深化。

贺阳的文章,观点鲜明,不回避矛盾。这一点,即使专搞理论的学者,也不易做到;对于一位现职官员来说,更加难得。三年前,当他还是北京市体改委副主任时,他说,“企业要求政府部门放权,政府要求企业‘练内功’,双方的努力均收效甚微。”他认为,“转换企业机制,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观点与当时的市委书记正好相反。他的上司认为“在转换经营机制中,企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真可谓针锋相对。当时他受到不点名批评,但他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其实,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一个学术观点或政策思路,可以讨论,现在也无需判断谁是谁非。值得赞赏的是,一个政府官员能够坚持与上司不同而自认为正确的观点。马克思有句名言:“批评必须无情”,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遇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一次深刻的利益调整。学

者们的一些观点,可能触犯某些非当权者,也可能触犯某些当权者。在触犯当权者与坚持真理之间进行选择,是对一位学者的严肃考验,尤其是对一位学者兼官员的严肃考验。贺阳在这种选择方面表现了学者的风度。

贺阳的文章,像他的为人和性格,朴实无华。他的文章选题来自现实的需要,分析问题透彻,文字通俗易懂。对理论水平较高的读者来说,能够启发思路,扩展研究领域,推进研究深度;对实际工作者来说,看得懂,用得上,还能举一反三,指导改革实践。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讲的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道理。我十分赞赏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风格。那种故弄玄虚,晦涩难懂、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文风,是不可取的。

我估计,贺阳还在做官时,已经想到下海。1993年1月,下海热或经商热兴起不久,一些人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颇有微辞。当时他著文呼吁“市场经济需要一大批人去经商”。并且列举许多理由,说明“这股经商热的到来是一件大好事,它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我赞同贺阳的观点。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下海的主要好处是:(一)培育大批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家,改变企业家结构,提高企业家素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二)正如当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规律一样,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学习市场经济规律,为研究、探索和提高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实践基础;(三)为学术界提供研究园地和研究经费,繁荣理论创作,支持理论创新。一个多世纪以前,正是由于恩格斯毅然“下海”,才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实践资料和必要的研究经费。在一定意义上说,伟大的《资本论》是学者马克思和“下海”的恩格斯的共同产物。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众多杰出人物中,官员兼学者、企业家兼学者的不乏其人,但官员、学者、企业家三者兼备的颇不多见。贺阳扮演什么角色呢?从经历来说,他的正式职业或者

叫做拿饭碗的职业是官员和企业家，学者只是“兼业”。但在在我看来，理论研究才是他一贯的职业。无论做官或经商，甚至早期的做工种田，他都没有中断思考，没有中断研究，没有中断探索和创新。如果说，做工、种田、从政、下海是他的“谋段”，那么理论研究则是他的“乐生要素”。在他身上，两者结合较紧密，发展较和谐。

人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有时不识时务者也可成为俊杰。不安份的贺阳，当社会上“下海热”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在官位上“安之若素”，虽然有时敲敲边鼓，呐喊助威，但自己却是巍然不动。当官场扬起顺风帆而商海波涛汹涌，不少商海里的游泳健儿“回头靠岸”的时候，贺阳下海了。贺阳大概以也可归为俊杰一类，但贺阳“不识时务”。不识时务者也可成为俊杰。其实，“时务”有大小之分、长远与眼前之别。贺阳确实不识“小时务”、“眼前地务”。为了回答人们的疑问，他写了《我为什么下海》；为了更有说服力，他在下海八个月后，发表《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大批真正企业家的崛起》。当人们读了这两篇文章后，还能说贺阳“不识时务”吗？他下海时想到的是自己将在“体制外促进并迎接新体制的到来”，想到的是“增加体制外的实力以推动整个体制转轨”，背负的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大时务、长远时务、根本时务。

贺阳下海了。人们对贺阳寄以厚望。在这里，我来补充几句：（一）希望贺阳真正下海，义无反顾，做个名副其实的体制外企业家，而不是“体验生活”、“下放锻炼”。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要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要为社会、企业，也为个人积累财富，“不想赚钱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二）希望贺阳为民营企业闯出新路。当前确实“有些同志，听到‘民营’二字就害怕，就担心”，社会上对民营企业 and 企业家存在不少偏见。这有传统观念影响的问题，也有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素质问题。我想，贺阳这位民营

企业家，不会受到“歧视”的待遇。但更重要的是要为民营企业闯出新路，使民营企业家这个新兴阶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正常的竞争条件。（三）希望贺阳不忘学者本色——勤奋、思考、探索、独创，坚持真理，不怕触犯不利于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我还希望贺阳居安思危。在中国这个处于转型社会的商海中，正常风险与非正常风险、可预测风险与不可预测风险、市场风险与人为风险都可能发生，理想与现实会有差距。经济活动是激烈竞争的漩涡，切不可掉以轻心。“愤怒出诗人”但经济学是冷静思考的科学，要多点理性思考，少点浪漫主义。

我赞同贺阳的观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不但需要一批清正廉洁、能力出众、富有献身精神的政府官员，需要一批具有真知灼见，敢于直言、不见风使舵、不人云亦云的经济学家，也需要一大批具有拼搏、进取、创新以至某种冒险精神的企业家。”1995年7月，在我的一批博士生毕业和访问学者结业的聚会上，我向他们临别赠言，现在以此作为这篇序文的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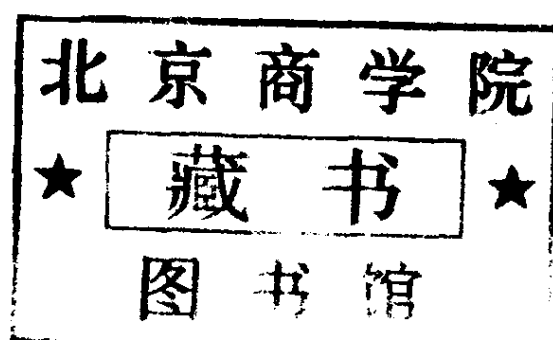
从政做官要廉洁
下海经商要守法
科学研究要创新
待人做事要诚实

1996年9月8日
于北京大学

学者·官员·企业家

——贺阳文集

贺阳著



09703236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四通”的启示..... (138)

乡镇企业发展的启示..... (142)

从“体制外”入手建立中国的商业银行..... (144)

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大批真正企业家的崛起——兼议体制
 内外企业经营者的环境与行为..... (150)

经营者年薪制刍议..... (163)

我看企业文化..... (167)

要重视通货膨胀 下力量治理通货膨胀..... (172)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75)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178)

为什么要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改革
 养老保险制度..... (183)

北京市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战略之我见..... (188)

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196)

改革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北京市改革开放成就巡礼之一..... (198)

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活力初步增强
 ——北京市改革开放成就巡礼之二..... (200)

改革使各类市场得到不同程度的发育
 ——北京市改革开放成就巡礼之三..... (201)

改革使科学技术变为现实生产力
 ——北京市改革开放成就巡礼之四..... (202)

改革使首都经济向外向型迈进
 ——北京市改革开放成就巡礼之五..... (204)

只有坚持生产力标准国家才能富强..... (206)

在深化改革中学搞市场经济..... (207)

市场经济需要一批人去经商..... (209)

随笔“决策”..... (211)

理清思路排除障碍—— 深化中国改革的关键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四年的历程。尽管开始人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但是实践毕竟一直在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市场取向的渐进改革之路。

十四年来,无论是在改革理论上还是在改革实践上,中国都有许多重大的突破。理论的飞跃是实践除旧创新的产物,新的理论又反过来推动改革的实践向前迈进。

改革理论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计划和市场二者关系的认识上。

1979年,陈云同志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这一提法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的报告。

198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把造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确定为今后改革的目标。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报告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改革的方向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曾一度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90年,提法又改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1990 年底和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两次专门讲到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才使多数人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方法手段,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从根本上解决了在计划和市场二者关系的认识及争论上的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搬开了多年来悬在改革理论探索上的一顶随时可能落下来的“大帽子”,使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思想更加活跃起来;在此基础上,1992 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向人们指明,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应该而且必须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过去人们一直试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各自的定义和理论、逻辑上看,这种想法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我们很难设想一种经济,既以计划机制为主配置资源,又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从实践上讲,这种“结合”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如果非要让二者结合,其结果就是经济运行的紊乱和社会上政治上大量腐败现象的滋生,前几年不得已而为之的价格“双轨制”,已经提供了许多例证;如果我们倡导“结合论”,把体制双轨、经济运行机制双轨这种一时难以避免的过程形态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那么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直到改革开放进行了十三余年之后才被正式确认而没有更早一点被确认呢?我看这里面既有改革实践方面的原因,又有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两相比较,后者显然是主要的。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国内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不是还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吗?其实,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单从实践和相应理论的角度

度看,市场经济的提出似乎应该是在 1988 年前后,那时可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只不过是因故换了一个说法——市场取向——而已。

尽管改革实践同改革理论一样,也难免受到传统思想观念和某些陈旧意识形态的干扰,但是实践毕竟不如理论走得艰难。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改革从一起步,实际上走的就是一条市场取向之路,一条通向市场经济之路——虽然人们过去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也正是因为踏上了这样一条难以逆转的改革之路,才使得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取得了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发展了,综合国力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作为对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左”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政治斗争的一种反动,改革开放激发了我们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活力,刺激这个世界大国向着现代化奔跑。

目前,中国改革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攻坚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力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综合配套改革,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和长远发展奠定可靠的体制制度基础。回顾以往的改革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利弊得失,看来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首先在于理清思路,第二在于强化决心,第三在于排除障碍。这三条如能真正做到,则中国的改革将会步子更大,中国的发展将会前景更加广阔。

(一)

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管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我却至今坚信不移。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和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改革,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对竞争性市场的重大意义,我看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不在创造市场条件——包括改革价格体制和建立市场规则等的同时,在塑造合格或比较合格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方面下力量并取得一定进展,竞争性的市场是不可能最终建立起来的。道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存在的,几乎都是传统体制下那种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没有什么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对价格信号和各种经济参数没有什么反应或反应极其微弱,那么即便有了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也不会有竞争性的市场;何况在这种格局下,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

中国十几年来在构造市场主体方面实际上主要是沿着两条轨道进行的:一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份;二是下力量改造国有企业以及被称为“小全民”、“二国营”的“大集体”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了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尽管经常碰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抵制和非议。乡镇企业、各种民办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等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作为国内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产物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果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式改革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的非国有经济这些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应该说,非国有经济是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立了大功的。一方面,它填补了一部分国有经济退出以后留下的“真空”,保证了商品、劳务的充裕和较高的就业水平,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它构造了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较为合格的一批市场主体,促进了市场的发育,同时也以其优于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强大的竞争实力,对国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和压力,逼迫国有企业尽快转变机制、提高效率。

国有企业的改革,几乎从中国改革一开始就被提上重要议程。最早是由赵紫阳同志在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省发起的,先后有过“小扩权”、“中扩权”、“大扩权”的尝试。直到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一条对企业放权让利的思路进行的,包括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采取种种措施,建立利润留成制度,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等;为了确立和巩固放权让利的成果,1988 年国家公布了“企业法”,1992 年国务院又颁布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尽管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企业的活力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但就整体而言,国有企业的机制尚未转变过来,活力明显不足,效率和经济效益还是不高的。对于这一判断,前两年一些人士并不承认,但是今天,多数人已经承认了这一现实。

放权让利的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在不对原有体制格局作大的变动的条件下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其效率的思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其实,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说是整个新旧体制转换的一个缩影,如果社会上多数企业的经营机制彻底转变了,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了,那么我们新体制的基础也就可以说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把企业改革想得过于简单,采取“单打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办法,肯定不会奏效,肯定不会解决根本问题。

要想把企业改革推向深入,要为市场经济构造出合格的或比较合格的市场主体,看来以下三方面的深化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一、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改造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后的十几年中,活力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但是面临的问题也相当多,许多企业甚至危机四伏。据国务院研究室 1991 年的调查分析,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亏损,三

分之一潜亏，盈利的只有三分之一；据中国工商银行的大面积抽样调查，潜亏的企业远不止三分之一。中国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从1993年7月开始都要按照财政部公布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尽管这“两则”同国际标准尚有一定差距（比如在企业成本的列支范围等方面），但是也将使相当一部分潜亏企业转为明亏，并使目前“盈利企业”的数量大打折扣。从研究分析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应该回避而应当正视这一现实：就整体而言，国有企业是面临着危机的。如果不在思路清晰的前提下痛下决心彻底改革，则国有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将不可避免地继续萎缩，一大批国有企业将走向事实上的破产；尽管“体制外”企业的发展会自动地弥补国有企业衰亡在经济增长方面留下的空缺，但是，相当数量国有企业破产所导致的工人大批失业问题，对社会、经济以至政治的影响，总是不可低估的。

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转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的问题；1991年下半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把这一问题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认识、加以强调。但是迄今为止，多数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的经营机制还远远没有转变过来，许多企业甚至转变的迹象都不明显。企业要求政府部门放权，政府要求企业“练内功”，双方的努力均收效甚微。原因何在？我看关键在于改革的思路存在问题。

什么是企业的经营机制？它是指企业在一定的经济系统中，由内外部条件所决定的经营发展方面的内在机能和行为方式。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就是要使我国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的内在机能和行为方式，从适应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产品经济，转变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

这几年，在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一种思路认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政府该给企业放的